

臺灣電視歷史發展的新眼光： 論教育電視作為一種批判戰後臺灣 民主工具化的印證*

程宗明**

摘要

臺灣電視發展的論述，認定商業電視為先、公共電視續後之論，本研究重新檢視，提出補充。匯集當年（1956-1962）籌畫教育電視到試播之史實，從歷史檢視與政經批判，發現是一個凸顯五零年代，處於美援民主價值，對立蔣介石威權重整之矛盾，而意外成功的案例。一個傳播新科技的建設，顯著帶來公共利益，讓有志者突破財政限制，與商業利益分道揚鑣。1958年一個意外的人事任命，開啟可能，從電機工程迴避爭辯，由硬體策略進入，達到試播與先發。

關鍵詞：美援、華美社、教育電視、傳播政策、電機、臺灣

* 感謝教育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研組研究助理王蕓瑛小姐，協助取得國立交通大學提供之相關史料。

** 程宗明為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研究員，Email: rmd6156@pts.org.tw。
投稿日期：2021/11/01；通過日期：2022/07/08

壹、前言

1962 年是臺灣電視廣播 (television terrestrial broadcasting) 的肇始，開創之先鋒者為「教育電視廣播電臺」，但是歷史書的記載常是單調的落筆；反而實際有風華為文者，為晚八個月後播出的「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企業與日資的背景，實為當年國民黨政權的特許與扶持本意，臺灣電視開播的紀錄，自然由「台視」實質獲取。

本文在目前公認的歷史中，重新省身自問：全世界於 1900 年以來的無線廣播的實驗開創，都以公共利益與教育為先，臺灣真的是自外於此嗎？與美國的商业電視臺制度為濫觴一樣，成為世界的少數意外例證 (exceptionalism)？如果要對這個已成的論述再作考察 (revisited)，勢必需對首開風氣的教育電視臺的背景重新檢視。該臺不但是當時的另一種選項 (alternative)，而且至今為止，尚未有文獻對於教育電視臺之成立背後，作政策與政治力之分析，所以這個研究很有價值。

根據西方發展無線廣播的歷史而論，各現代國家都歷經將電磁學發明應用，授權給商業團體做特殊使用。之後，工業成熟後，政府就面臨頻率為公共利益或私有財的兩派主張之相爭 (Streeter, 1996)。美國作為一個世界領先開發無線廣播電視之先進，選擇自由經濟的所有權主張，與國家公共資源共有主張對立；同時 1927 年以後，因進行無線廣播頻率重整，排除干擾的根本問題，美國社會進步團體透過運動提出 Wagner-Hartfield 修正法案，在之後七年當中，經歷一場影響深遠的頻率公用的哲學辯論 (Balas, 2003)，確認非營利廣播 (noncommercial radio) 與公共利益受託人角色的商業電視 (public interest trusteeship) 是對等的角色，雖然聯邦廣播委員會 (Federal Radio Commission) 成立之後，前者衰微後者興盛，但是這種美國傳播發展模式的看法，有效地影響二次大戰後，受美國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包含臺灣在內。

以此時代背景來論，臺灣於 1949 年重新站立，位居美援經濟資助與防衛的西太平洋防禦戰略線上，接受發展電視這一項，不能忽視商業電視 (commercial TV) 為主導的美方思維之勸進，而與其對立的教育電視。又如何能在這個關鍵十年，也發展出一條生路，此為本文調查與析論其源起的興趣所在。

貳、教育電視興辦前的政經環境

1949年蔣介石在臺灣重新鞏固中華民國政府，並執行運作，但也積極反攻延續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在這樣的對峙與矛盾的狀態下，美國逐漸改變了本來放棄蔣政權的立場（對華白皮書），也因韓戰的爆發，啟動了西太平洋聯防的體系，臺灣於是獲得經濟與政治上的資源與防衛協助。但是，根據近年來更多出土文獻顯示（殷惠敏，2016），總統杜魯門的支持是有條件的。為了不再發生美國內部對蔣政權在統治上的腐敗無能紀錄的反彈，這波支持，對於治理的選擇有設下條件。在政治方面，由吳國楨取代陳誠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另外軍事將領孫立人，也在美國勢力的建議下，在臺灣身負陸軍總司令、臺灣防衛司令兼臺北衛戍司令三項重職；這項任命，迥異於過去國民政府用人排序的考量，顯見美國強力地介入，做為援助之交換條件。

美國此舉顯然是標舉戰後的援助政策，必須搭配建構美式的政治價值、政治文化與制度，很明顯造成當時國府接受美援將產生內在的矛盾，蔣政權必然進行逐步抗拒。依據目前臺灣戰後發展的政治研究所見而論，美國介入的事實經諸多考證，無疑義。但是從吳國楨選擇流放美國、孫立人旋即被拔職與軟禁，可知這應該就是國民黨政權開始重掌自己步伐的事證（Tucker, 1994／新新聞編譯小組譯，1995）。

簡要說明，蔣政權只是權宜用自由中國之民主象徵，取得先期偏安的掌控。一些民主憲政與地方自治的實施，還有對知識分子的尊重與延攬從政，顯然成為這個矛盾環節中的產物，也就是有了對民主推動的承諾，讓部分傾向民主人士可以研擬各種新政，而且大量引用美國的經驗。但也因蔣介石將民主當成生存的工具，所以此階段一過，就不再持續開放並收攏權力，僅讓五零年代進步制度的引入，當成一個短時間存在的樣板。

顯然的，發生上項人士更替事件，象徵國民黨政權逐步穩固在臺灣的立基，據此與美國周旋，爭奪與美援脫鉤的人事布局權。然而，以當時政治發展研究的立論來看，國民黨政府以限制政治參政、扶植情治與安全系統接班、擴大打壓政治異議分子的事證來看，其實是一種背叛當時美國式民主的意義。

回應於政治民主化的研究而論，這個背景從美國來看，應該是一

種民主存續的失敗。雖然臺灣在 1949 年進入戒嚴時期，談不上真實地朝向民主憲政之路，但是在國際冷戰陣營中，常常自以民主自由為號召，成立「自由中國」（Free China），而美國也在狀似肯定外貌下，維持盟友關係。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者 Larry Diamond，稱此為民主無法存續的「非正式制度規範」現象，他論述現象的原文如下（田弘茂、朱雲漢、Diamond、Plattner，1997，頁 14）：

- 一、政府高官有各種巧取豪奪行徑，如侵害人權、迫害反對人士、選舉舞弊等，民主代議制僅是空架子；
- 二、濫權菁英沒有直接違反民主憲政規範，但是沒有心存貫徹之使命，倒是有相當多的基於工具性價值的考量，而願意繼續保有民主形式，爭取國際社會之援助；
- 三、要是國際社會的壓力減少，這些脆弱的民主政治也將消失。

此外，政治學者 O'Donnell（1997，頁 107）也指出，一些初步進入民主陣營的國家，不能只從是否有定期選舉的舉辦來評斷，另有三項自由：言論、新聞、結社是否被納入政治制度，必須連同考量；如無，單有選舉，且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本質就相當稀薄，反而侍從主義與特殊主義的非正式規範運作，才是關鍵影響力。

Lin & Stepan（1997，頁 79）則指出，新興民主國家也面臨一種基本質疑，就是用單一民族（Nation State）是否可以形塑現代民主國家，或者與多元民族的本質可否共存。Lin & Stepan 接續批判，實際最壞的狀況是：

- 一、形塑國家為單一民族所有，也為此民族而生
- 二、優勢民族語言成為官方與教育上唯一可以接受的語言
- 三、優勢民族使用語言當成國家社會化的控制工具（透過廣播、電視與教科書來達成）

在這個政治制度化的局限下，這前十年臺灣尚無「電視」的時代（1949-1961），國際間戰後的傳播科技蓬勃進展，促使國內有興趣人士奔相傳遞與呼聲導入。就這個侷限來說，美國方面從杜魯門總統發表白皮書之後，對於蔣政權就是高度的不信任，同時對於蔣經國可能是繼承人，提出諸多質疑。而吳國楨在任內，也對蔣經國在臺灣社

會中使用情治偵蒐的非法，給予指控，同時要求蔣介石節制。另外，孫立人軟禁更是到蔣經國過世後，才給予翻案並還予清白。此事證都是顯示，當年擺盪在美國與蔣介石之間，對於臺灣未來接班治理的爭奪情勢，蔣經國是一個爭議性的核心人物。

就這個國內環境變動與國際政治詭譎的滾動之中，與電視科技的引進產生如何互動？又如何牽涉到美國與蔣介石對於臺灣治理的委任人選爭奪有關。首先，就電視引進之事務，本質就是國際事務，同時也屬於美國援助臺灣相關技術合作之方案。其次，電視之設立，為大眾傳媒的新興宣傳利器，必然牽涉到民主之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因此由誰導入，由誰辦理，由誰發包，到由誰經營，這都涉及了當時政府主責文化與媒體的人士，誰被賦予如此之權利，誰來定義臺灣「電視」使用的發展意義與空間。當年繼吳國楨出走流亡美國後，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與新任行政院院長及閣員身分，就透露出蔣介石拿回主動權之意向，造成初步的影響。

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教育電視」（educational TV）該一業務歸屬於教育部執掌，而且在1949年之後，電視之前身，廣播事業（Radio）被列為新聞文化事業，於1952年正式由教育部設立「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進行規範；至1959年以前，該部都負責審查廣播電臺之設立、指導廣播節目之設計、審核從業人員資格與登記、考核廣播事業之表現等。可謂，導入教育電視臺之前，該部全權管轄廣播事業之平常運作。於此，這段引進電視十年期，聚焦教育電視這議題，匡列三位教育部長，始從張其昀（1954-1958）、梅貽琦（1958-1961）、至黃季陸（1961-1965）等之人士軌跡，可說明出一個互動景況，鑲嵌入本文前論，所謂美中之間對於戰後臺灣民主委任治理權的競爭，如何在此議題上產生作用。

首先，張其昀本人，出生教育界，因緣在浙江省大學服務，成為蔣介石的同鄉之重要幕僚，於是出任1949年後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主任，負責「中央改造委員會」的召集，當時該委員會為一檢討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的機構，並負責緊縮嚴管而非民主改革措施（彭懷恩，1990，頁162）。張其昀（1953，頁55）在任內，出版了權威的《黨務概論》，其中對於媒體宣傳事務展現高度抱負與興趣，他為國際傳播定調如下：

宣傳的目的：在於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對外要爭取友邦同情與援助，對內要糾正分歧錯雜的言論思想。

此一演繹，充分顯示出國民黨改造思想之意圖，在於統一內部團結與口徑，而非營造民主多元之文化。張其昀離開黨部後，隨即出任教育部長，在任內建樹頗多，同時打造關鍵基地稱為「南海學園」，包含歷史博物館、藝術館、科學館、教育資料館與中央圖書館，其企圖心持續壯大，希望建立廣播電視於同一園區。

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改造委員會也對媒體展開整頓，其中對於中央通訊社有很大變革，成立管理委員會，改變原本指揮體系與人事，原社長蕭同茲驟離管理職，同時張其昀也親自來調閱中央社的電文進行清查，頗有查緝缺失與糾舉共黨之意（周培敬，1991，頁 374；馮志翔，1974，頁 284）。

不過，張其昀任內並未成立教育電視臺，反而以失敗告終，這是他建樹中的一個意外。結果，成立教育電視臺這件事，反而沒有熄火，持續交辦到下一任部長手上。

接續部長的梅貽琦，是一個意外的任命。梅貽琦是國民政府時期清華大學校長，也是戰時西南聯大之校長，享有很高學術聲望（陳力俊，2020）。他受惠於庚子賠款之退回款作留學資助的第一批學員。所謂庚子賠款之退回方案，為 1908 年由老羅斯總統提案，美國國會通過，提撥一千二百餘萬美元，專門做為派遣中國青年赴美深造之用，同時在北京成立清華學堂，作為青年赴美深造的預科授學所在（胡光熙，1981）。位份崇高的梅貽琦，是清華大學體系的領導人，也象徵國民政府時期，留美學人從政的領頭地位，可以想見與張其昀所代表的中央改造勢力，視野完全不同。

更有甚者，梅貽琦在國民政府期間，以及在西南聯大治校時，包容政治異己之知識分子，而受到各黨派尊崇（岳南，2019）。在撤退北大過程，也受到追隨與反對國府的知識份子信任。在中國急劇變換政權之際，先代表國府出席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技會議，之後以受教育界委託，直接轉赴紐約固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管理權，同時就任該會轄下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之常務董事，該社為受委託管理清華在美的庚子賠款退回基金，而梅貽琦的任務，就在確保這筆基金持續在國民政府的掌握中。

自此，梅貽琦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之特例，常駐美國，直到1954年才被蔣介石邀訪回國做考察，之後仍駐美並往返頻仍。梅先生透過清華大學師生關係與管理清華基金資助眾多赴美留學志士，形成一個工作網絡，超越當時國民政府任一派系的勢力範圍，而得從教育與學術立場，運用基金產生對臺灣新政府的影響力見（岳南，2019）。

在梅先生周圍的有能力的工作者，包含當時臺灣省政府秘書長浦薛鳳（清華基金留美博士），曾任中華民國出席鄧巴頓（Dumbarton Oaks）四大列強會議，以及舊金山和約與聯合國草案起草之中國代表人，也是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他不但是其學生，也是接待其首次回臺的主人。浦薛鳳後來成為梅貽琦的教育部政務次長，負責教育廣播電臺之成立專案。

另外，梅貽琦與清華大學校長之地位，對吳國楨、孫立人等校友皆為熟識，梅甚至在取得蔣經國同意下，曾在臺灣探望過軟禁中的孫立人。而浦薛鳳之長子浦大昌在其家書中（謝國興，2015），也屢屢提到梅本人，以及吳與孫之長輩關係，可見清華學堂這種關係，在那個時代中維繫著一個很緊密的網絡連結，透過美國留學之境遇得以傳承與擴張。

梅貽琦自1949年於美國進行這些學術行政，外加他在清華基金與留學網絡中的聯繫，認識了諸多交通大學復校前的校友，包含前校長凌鴻勛（當時中國工程師學會在臺復辦的領導人，後來負責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的籌備主任）；交通大學校友的李熙謀博士（哈佛大學電機學，科學教育委員會主任，繼而受邀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在這個關鍵位子上，協助建構教育電視臺的發射裝置）。李熙謀本於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的第一任會長，也是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掌握到關鍵技術與資金。電子所草創的一些重要師資，如負責人張去疑，出身清華電機學系，也是梅貽琦很早就邀約網羅的人才。

以上的記載，很明確地看到，梅貽琦在部長任內，對於電視發展政策的強項，在於掌握了電機工程的人才，與這些人網絡中可以申請到的資源與資金，這對於教育電視發展，本只有純理念與管理之部務，做了很大的突破與推力。換句話說，梅貽琦本人象徵了美國價值與留美人士的網絡整合節點，也是當時雲捲鋪蓋而來的國民黨威權之下，綻放一絲不同的亮光。

在梅貽琦病重後，接手教育部長的黃季陸，則是一個不墨守常規喜愛創新的部長。黃季陸在當時國民政府當權的同輩中，輩分頗為高深。黃季陸於十二歲就發起同志會，參與了反對滿清運動；隨後因人介紹，由孫中山先生親自召見；青少年留學之前，屢次參與民國初年革命黨的運動；又以二十五歲之齡，參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與共產黨份子產生激辯，成為反共先鋒。當時，黃季陸這些資歷，已超越同期的國民黨所謂「忠貞」黨員的事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6）。

黃季陸也是早期留學美國之志士，參與海外華人媒體經營，也任教四川並作大學校長，如此又成為教育圈之一員。1949年之後，黃季陸來臺服務於中央政府，至接任教育部長前，持續與教育圈大學校長之間保持密切關係。但是，黃季陸喜於接收新事物並發表看法，這種作風也迥異於保守的教育圈。

他自述 1955 年代表政府率團前往日本，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的亞洲區委員會，於席間觀察日本電視發展的進步情形，首次研議將其應用在教育用途上，同時回去與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分享這個想法。黃認為，這個新知後來影響了部長計畫於南海學園內，用科學館的屋頂做電視臺的基地一事（賴淑卿，1986a, 1986b, 1986c）。換句話說，黃認為「教育電視」這個概念，是由他動念產生影響力而來，這樣表態顯示胸有成竹。

黃季陸在各種文章當中，屢次提出與梅貽琦之友好關係，並常與梅以酒相交分享局勢看法，包含前往日本開會那次，也是與梅一同觀察該國的先進發展（黃季陸，1986）。事實上，在梅貽琦的日記檔案中，就明確記載了 1956 年 7 月 21 日在自由之家，由張其昀作東，邀請梅本人、黃季陸、李熙謀與美籍顧問等，談論在臺灣開辦電視的可能。這點可證，教育電視發展這件事，在這三任教育部長的公私人關係上，都常以此為題，進入可行性的討論。

但是終究，這件事的成功底定在黃季陸部長的任內，在其個人的著作與散論，及致敬他的紀念文集中，都將「教育電視臺」的政策或功績紀錄在內（黃乃興，1986）。但當時不同意的一方，對黃季陸持續推出教育電視專案計畫，派遣專家持續到美國考察，並提出更長程與經費擴大之服務，取笑戲稱「太空部長」。

但是超越前任，發展教育電視這件事，黃季陸留下了政策論述、

國建方案、以及國際合作等規劃。而 1965 年他被解除教育部長職位後，這些事也人去政息，顯示出他已超前了當時政府意願發展的規模與高度。

如此，正如政治學者彭懷恩（1990，頁 162）所言：「五零年代初期的臺灣政治，就是在國民黨重建威權與維持民主表象的兩種不同發展方向上，呈現出許多矛盾衝突」。雖政治自由程度反較六零年代為寬廣，因要維持「自由中國」之形象；但也隨美國支持的力道穩固後，展開言論緊縮政策，並且讓蔣經國逐步接班政務。教育電視臺之籌備討論，到後期意外地超幅建設成功，又像強弩之末，隨即進入保守之作，都與時代的刻痕對應互動。

參、教育電視臺之籌備運作再發現

根據目前文獻的記載，展現教育電視臺這件事的歷史研究，概分兩種論述型式。一者為歷史編年之記載，以成者論，同時較侷限於文史的觀點，綜述政府、民間、學校之間的合作，如流程般的順利開展（徐鉅昌，1986）；其二為教育電視臺開臺之後的規劃、播出與服務概況，認定這樣的發展合乎社會進步之意義（王小涵，1969；宋乃翰，1962）。兩者，共現一種歷史記述，就是始從 1956 年張其昀提案企劃開始，立刻跳躍至 1962 年 2 月在全國教育會議上展示為誕生處，中間六年完全空白（梅長齡，1991）。

在眾多如上兩類的文獻中，只有當年社教司長劉先雲的訪談錄（遲景德、陳進金，1995），呈現出有關政策推行的層面，與緣迎其中的人事物。透過這條軸線，可以發現政策面的當事人陳述，但還少了大時代背景互動評析，這也是本文再次發現必要著手的面向。

如以政務層面的切入，回溯黃季陸在 1956 年出席日本東京的 UNESCO 會議上的電視所見，除了技術科技外，當年日本 NHK 在戰後發展的廣播電視制度，也很重要。根據美國知日傳播學者 Catherine Luther 的研究顯示，當時的日本廣播電視制度，已經從美國託管當中，演化出一套現代化的日本規範主義（Luther & Boyd, 1997）。

首先，先看黃季陸鋪陳這段在日本與電視奇遇的心情背景（賴淑卿，1986a），

我此次重到東京、橫濱之前，滿以為日本在第二次大戰

期內，遭遇了那樣重大的戰時轟炸，必定瘡痍未復，至少仍可看見若干戰時被毀的痕跡，以供憑弔。但是今日的東京與橫濱，又已第二次重建起來了！而且重建後……照理，日本是一個戰敗國，而我們總算是第二次大戰後一個戰勝國，日本戰敗後的復興，如是其迅速驚人！而我們於戰勝之後，卻遭遇著共黨的猖獗，……這一對比，使人真不知涕泗之何從了！我這一種沉痛的心情……相反的，日本的復興，正值得我們之借鏡與反省（頁 284-285）。

那當時黃季陸訪日時，看到電視之景象，其背後制度發展到如何呢？Luther 與 Boyd（1997）記述得相當清楚：日本在 1952 年簽署了和平協約，終止了美國駐日最高當局（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的託管；因此，混雜了美國導入的廣播電視獨立管制精神制度，與日本強大官僚行政體系的行政指導，的確有一番進步的時代取向。相關變動如下：

- 一、Radio Regulatory Commission 依行政命令終止運作，由郵政與電訊省接續管理大權在握，但是終止之前通過的商業電視廣播制度；
- 二、在新的管理制度下，NHK（日本放送協會）必須處於政府官僚與媒體專業的互為依恃發展的模式（codependency）；
- 三、NHK 之董事會組成，劃入日本首相辦公室之任免權限範圍；
- 四、NHK 規劃之年度預算方案，送郵政與電訊省核備，官方無法改變方案，但是可以加註建議與評議，並送國會進行最後審查與核可；
- 五、如此制度，給予日本官方某種槓桿之作用，施展影響廣電內容之趨力。

日本廣播電視之現代化初步成果，對於臺灣夾雜在美援開放自由與國府安全顧慮下的考量，應該很有理型的指導作用。在另一篇回憶文章中，黃季陸也清楚記載當年在王子大飯店（Grand Prince Hotel Akasaka）住宿時，與梅貽琦共同出席聯合國會議時相處十分愉快，共同見證電視之神奇功能（黃季陸，1986，頁 219）。

換句話說，黃季陸與梅貽琦，因著過去海外經驗與當時政務需求進行外交之誼，享有比國內一般政務人員更了解先進傳播科技之實。

此一見識，如果相比於臺灣電視史的官方導入記載，極為相左。最早引進電視新知的美援方案，就是 1953 年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央通訊社社長曾虛白之訪美行程。曾虛白在為期四個月考察中，特別針對商業電視包含費城 WCAU、紐約 NBC 總臺、CBS 總臺；教育電視臺聖路易斯的 KETC、洛杉磯的 KTHE、舊金山的 KQED，總計做了六個個案研究。這段訪問期間的報告，對於商業電視臺，曾虛白給予一種紀實報導，認定這是一種既成體制（establishment）與主流當道。反而，對於教育電視給予更多政策方面的辯難與著墨，如曾虛白（1955b）提到：

教育電視既是一個反商業性的運動，自然不是一件容易賺錢的業務。……因此，要使教育電視運動順利發展下去，最主要的問題還是錢。怎樣可以籌募足夠的錢來創建開辦，尤其重要的是怎樣能夠經常維持趣味濃厚的好節目來爭取商業電視的觀眾，這都是教育電視運動的成敗關鍵（頁 68）。

曾虛白在這裡引介教育電視臺的觀點，是直接視為一種替代性媒體（alternative media），非主流的，而且是由民眾從下而上的募款，由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給予殘補式（complementary）保障頻率而存活（全國廣播頻率量的 12%）。

而曾虛白回國後，的確為此作了專題報告，並向支持國家教育電視的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張道藩遞交兩種電視創建計畫（趙友培，1975，頁 466）。第一種取向是 RCA 提出規劃，透過電視機生產與政府補貼，發展起國家電視概念，設置中小學定點收視，做集體教學；但也可在高等教育受教需求中，發射訊號，讓市場上求過於供的學生，以購買空中大學方案得滿足；第二種計畫是 UNITEL. Incorporated 設計的微波電視建議潤飾方案，他在後續一篇文章中，說得更清楚（曾虛白，1955a），

全地球的陸地與陸地間的距離，沒有超過二百九十英哩者，這都是微波站可以傳遞的距離。因此，他們已在計畫把歐洲電視網跟美洲電視網聯繫起來。目前擬妥的藍圖是從北美經格林蘭，……在亞洲部分，專家們又計畫著另行建設一個電視系統。這系統是以日本為起點，南及沖繩島，推及我

臺灣。臺灣建設成功之後，再南下……（頁 163）。

以上當年這段看似鋪平的介紹，後來經過美國冷戰檔案之解密，確認這是美國安全機構與情報網的建置理想，透過電視來完成，是一個戰略的目標（有馬哲夫，2013; Schwach, 2009, p. 87）。對照於黃季陸等人的想法，曾虛白當年可是大張旗鼓，同時也受到美國勢力的指導，讓電視成為美國全球工業與安全輸出案，可在臺灣實踐的戰略工具。

但是史料諸多記載，他的上書「創建電視上總裁書」（五千餘字），卻被下放至行政院項下審核，受到各路競逐的說客勸阻而延宕無下文。政府怯步的考量，依舊是經費不足與優先順序之不及，在 1955 年之前臺灣就擱置了電視發展計畫。

曾虛白自 1952 年起任職教育部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此他的意見書也進入教育部興辦之檔案中。這第一波失敗，並未阻卻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推動。承上，張部長有中央黨部的直接支持，還有總裁給予的信任，的確在他任內有大舉推動教育館舍興建工程的實績。但是「教育電視」這個方案，則是按部就班，又須多角連結，希望能克服朝中的反對意見。張其昀（1955, 1956, 1957a, 1957b）律己甚嚴，每年出版《新教育論集》向外界公布他的政策與規劃。

1955 年出版的第二冊論集，張其昀在各層面的社會教育目標中，都深植「教育廣播」與電影之重要性。而 1957 年的第四冊，正式將電視納入電化教育（educational technology）的一員，於國立臺灣科學館的未來規劃中，納進空中大學的播音室，增建工程也將廣播電視發射的裝置，預先放在新建七至九樓的空間中。1957 年的第五冊，舉凡音樂推廣、社會教育、電子科學之研究旨趣，都將「教育電視」的功能納入成為實現的工具，至此則是張其昀任內，胸有成竹進行第二輪的教育廣播推動大業。

但 1958 年的景況驟變，在張其昀（1958，頁 176, 178）出版的第六冊當中收錄二則對外答詢的文字紀錄，其中都提到了教育電視之設置問題，這裡有兩點具體回覆：

- （一）電視為民間及國際投資，但與本部合作，目前正接受美援之協助（4 月 5 日發言）；

(二) 有關教育電視之具體計畫，須經行政院之核定，本人目前尚不便多所說明。現可奉告者，有關各部會代表正著手研究策劃，在不增加國庫負擔之原則下，當遵照現行法令，從各種角度，作緻密之商討（6月6日答覆媒體之紀錄）。

很明顯地，這個問題又回復到不增加政府經費之負擔，要由行政院整體考量，給予相當保守的評估，而且連教長自己都不便對外說明。在即將卸任（七月）之前，顯見教育電視之想法，已無把握推展，遭政府原本一貫的財務掣肘，使張其昀必須低調表示以示忠誠於政府體系。

張其昀在意外的狀況下臺，交接甚為簡短，離去也甚速，史傳記述了這不愉快的過程（岳南，2019，頁 494）。而新任閣揆是副總統陳誠，因他的意志選擇了梅貽琦繼任教育部長，跌破政海圈中的眼鏡。

但是這也是臺灣五零年代逐漸邁入言論緊縮的時刻，1958年3月28日行政院以「密件」方式，將出版法修正案送立法院審查，給予政府新的權力，可據修正條款撤銷報紙與雜誌的登記執照，並且加重處罰，引發軒然大波，尤其來自各大日報的抗議（陳國祥，1979），但是在83天秘密審議下，強行通過。5月27日，梅貽琦甚至受雷震之邀，出席了《自由中國》對於出版法通過後情勢的意見交流會。根據研究當時的背景之說（薛化元，2020，頁 292），政府的行動在於對付《自由中國》越來越強的政治批判系列「今日的問題」專題報導。但同年7月也發布副總統陳誠回歸接掌行政院院長，陳誠是美國這方相比於蔣經國更願意見到的接班人，他本人也比較有願意提拔留美的學人與技術官僚（Tucker, 1994／新新聞編譯小組譯，1995，頁 142）。

很明顯地，這個時節點，陳誠下決心找了梅貽琦取代了蔣介石屬意的黨務人選，因梅先生的背後有掌握清華的人才脈絡，同時熟識華美社的中國優秀物理學家（江才健，1989年7月11日）。這成為國民黨各方都必須接受的依據，更是陳誠時代的表徵。於是梅貽琦在籌備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之同時，也兼任教育部長。而因梅先生的相忍為國，院長也必須接受他直接推薦留美人士接任政務次長（浦薛

鳳，清華留美體系）、常務次長（李熙謀，浙江公費留美與交通大學），還有同一時期的閣員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留美心理學學位，前西南聯大教育學院院長）。這個任命連結，其實帶出一個專業化的執政團隊，又稱「交大清華的電科人物」（胡光熙，1981，頁257）。

這些人才，配合著張交接未完成的「教育電視」的任務，產生了相當強的催化作用。首先，梅貽琦本人是當年代政務官中，少數有「電視觀眾」經驗的部長（1949年至1958年在紐約的住所有電視機）。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美國某些類型的節目收視經驗，如下表所列：

表 1：梅貽琦記載觀賞之電視節目（1956-1958）

年代	節目名稱	類型
1956	Dickens' Great Expectations	TV Series
	Lost Boundaries	TV Film
	Farm Bill Veto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Press Conference
	Dodgers-Phillies	Sports (Baseball)
1957	Till We Meet Again	TV Series
	Army-Navy Game	Sports
	The Bells of St Mary's	TV-Film
	A Christmas Carol	Concert
1958	Dr. Jekyll & Mr. Hyde	Horror Drama
	Forever Amber	Adventure Drama
	Dr. Paul Ehrlich's Magic Bullet	Biography Drama
	Jupiter Satellite	Special News Report
	Enter with Caution: The Atomic Age	Documentary
	Disraeli	Historical Drama
	Anita Garibaldi	Historical Drama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Family Drama
Portrait of Jennie	Mystery Drama	

資料來源：《梅貽琦文集【日記】1：一九五六～一九五七》，楊儒賓、陳華，2006 新竹：清華大學；《梅貽琦文集【日記】2：一九五八～一九六〇》，楊儒賓、陳華，2007，新竹：清華大學；類型資料作者整理自 IMDb 資料庫 https://www.imdb.com/?ref_=nv_home

梅貽琦的行政風格據葉公超的評價為：「慢、穩、剛」，在他任內並未提出要立即興建電視臺之議，隔年（1959年）3月11日，他還在總動員會報文化小組會議上，建議舉辦不易，也非急切需要。但是他在部內進行行政改革，先讓教育廣播成功上路。

根據《劉先雲先生訪談錄》的記載，1959年2月首次由政務次長浦薛鳳主持廣播電臺興辦會議（遲景德、陳進金，1995）。上任時，次長強調根據部長的去衙門化指示，裁併毋須機構，每週召開各司事處主管會議，攜帶公文要事進行討論，逐一批定，增進效率（浦薛鳳，1983，頁80）。在這樣行事風格下，教育廣播列進行政院預算建議案，於3月28日通過成立。但是接續又逢電臺編制問題阻礙，這時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出手協助，給予行政協調之權宜，讓案子先過，這樣延宕一些許之後，於1960年3月29日，在梅貽琦的錄音祝賀聲中，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正式開播。

然而，同時期教育電視臺之推展，較難上路。根據劉先雲口述記載，1959年3月，已經著手將電視建設計畫擬定，然而卻不被行政院支持，無法列入十年經濟發展計畫（劉引述陳誠公開反對此案，遲景德、陳進金，1995）。1960年4月以後，梅貽琦已經病重無法視事，教育電視臺政策之責，就由常務次長李熙謀的電機專業，接手執行。

在此之前，梅貽琦協助交通大學成立電子研究所時，積極洽詢人才，造就一些重要的基礎建構。1957年政府通過交通大學復校並先建電子研究所，由凌鴻勛（前交大校長，梅先生之好友）任主任委員、李熙謀任副主任委員，在清華大學籌備處的資助下，於1958年10月10日正式於臺北實踐堂開學，梅貽琦致詞祝賀。第一任所長為李熙謀，因兼任另請臺大教授盛慶球代處理業務，相關財務歸李熙謀洽美援計畫提供支助。1960年代理人離職，再請交通大學校友康寶煌與李恆鉞接手系務（李熙謀，1967；盛慶球，1975），同時又得當年梅貽琦請託交通部次長錢其琛、電信總局局長陳樹人之幫忙，將東南亞電子研究訓練方案納入，由交通部電信總局於1960年2月發文至聯合國電信聯合會（ITU），5月獲得通過，申請到聯合國特別基金（U.N. Special Fund）美金33萬元，成立「電信電子研究訓練中心」（United Nations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ele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s）於交大電子所（黃富三，2010）。此時，梅貽琦正式住院請長假，部務會議由浦薛鳳負責。

1961年2月雙方正式簽字，3月聯合國特別基金正式撥款開始執行，此時教育部長已由黃季陸接任。而前受梅貽琦請託清華大學電機校友張去疑，學成歸國適時加入該所任教務主任之職，綜理各項計畫，之後李熙謀也辭去次長一職（改兼科教委員會主委），改專任所長逕行處理與ITU聯繫採購事宜。

綜上所述可知，在梅貽琦部長任期最後一年，實為電視技術成長驗收的初期。以致黃季陸部長上任後，持其初心對於教育電視的大力支持，得以從硬體方面先行著手，改變原本電視創立的內容與言詞紛爭。根據劉先雲口述回顧，第一年8月份，部長就在陽明山召開當前文教措施之第二次會談，於報告中以廣播電視發展簡單帶過，但是決議上就是要盡速建立教育電視臺（遲景德、陳進金，1995）。教育部以「大陸光復後教育文化重建問題結論」、「當前教育措施問題結論」兩個名義，來涵蓋這個政策如下（教育文摘，1961，頁31, 33）：

（二）乙、（五）社會教育之推行①設置全國電化教育網（包含廣播、電視、電影等）。

（三）五、關於社會教育者②推廣大眾傳播，利用廣播、電影、電視、增進國民的知識與道德，轉移社會風氣。

據此，教育部研擬方案，透過與法有據的實驗性試播，開始逐步落實的策略。這期間甚少談論國家經費是否有長足編列可能，也不問人民是否有消費力購買電視機的民生問題。依據交通部呈行政院交郵（五一）00757號文，清楚顯示，1962年1月接獲教育部兩函暨附件，將文教措施研討會紀錄暨陽明山第二次大會談有關文件檢送，同時行政院也囑咐交通部研議辦理相關決議。此致，教育部逕行申請設置電視臺，並直接請發試播執照。

這個文件清楚說明，教育部依照當時陳誠兼院長之出席確認的文教措施結論，擬准予架設，突破了之前在政務協商過程的經費爭辯，或者說以「試播」名義，免除這番討論程序，而取得電臺臨時證照（同時依規於試播六個月後，正式改為一千瓦特功率發射），這樣等於鋪路到可以正式播出。

而這番平行於行政程序討論的同時，1961年10月28日，部長囑

附社教司長秘密進行籌備事務。旋即 11 月接獲中國工程師學會成立 50 週年舉辦契機，凌鴻勛與交大電子所商量展示物件後，就立刻將電視發射機列入考量，獲得部長高度支持。在接獲聯合國資助與其他現有資源下，由李恆鉞主責，獲得李熙謀同意，組裝一臺五十瓦電視發射機，並在南海路國立教育資料館頂樓置發射臺，形成一個示範的環境，將展示處設於當時臺北新公園，做了三天的公演，接獲不錯的反映。

之後黃季陸指示，把現場設備保留，器材持續更新與擴充展示內容，同時規劃出其財務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准。財務分別由交通大學向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申請、國立教育資料館向美援會申請，另外教育部以建教合作方式向大學分攤來進行。如此方案，使得工作人員放手積極準備進入試播展示。黃季陸安排在 1962 年 2 月 14 至 16 日於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國府遷臺後的第一次）上展示，並且作象徵性的按鈕開播。

根據張道藩的描述，黃季陸的作風如下（趙友培，1975）：

季陸是本黨的老同志，善於言談，富於理想。致力研究民權初步，早年曾受國父賞識。這位四川人面團團如彌勒佛，笑口常開，是個樂天派，常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擺他的「龍門陣」，很有風趣（頁 466）。

據此，可以理解 1961 年之後的教育部，在黃季陸的行動領導下，破除了一些政治上官僚氣息與限制，讓勇於任事與突破行政程序障礙成了風範，必要時他也越級指導，如電子所的李恆鉞就在工作回憶中提到在困難中部長給予的鼓舞（張俊彥，1964）。而黃也會轉彎讓論述改變，如在全國教育會議上，將教育電視開播歸功給交通大學的電信與電子訓練研究中心的努力，以及梅貽琦校長，移轉政壇對於過去全面興辦電視建議的財務負擔之疑慮。

本研究從編列經費的方式，也可了解教育部新的推動教育電視策略，則是先試播再談營運計畫，以排除編列常態預算的冗長爭辯。首先，於 1962 年 1 月，接近試播預定日前一個月，社教司召開了第一次「教育電視實驗電臺籌備委員會」會議，將經費編列方向擬定一個概略方針，顯示以逐步編列、邊作邊支為策略。將這個報告與後續逐項

落實的文獻對比，可知教育電視廣播電臺初期的生計籌措景況如下表列，證實前述的策略做法。

表 2：教育電視實驗電臺規畫預算與落實情形

預算類別	額度	籌措方向	後續進度	備註
工程預算	第一階段美金九千餘元 第二階段美金九萬餘元 第三階段美金二十六萬餘元	向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編列進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公署美援項下	1963 年終至獲得美國國際開發分署與美援會同意補助新臺幣兩百一十六萬餘元	此為三年期逐年分期編列計畫，被通過額度涵蓋前兩年
業務費	新臺幣三十七萬	由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列入美援計畫經費支付	1962 年計三十萬元由教育部支付	另列節目及業務費三十萬由美援申請支付 1961 年行政院核定辦理經常費粗估一百八十餘萬元
實驗期間工程費	新臺幣六萬元	申請美援計畫	先由教育部暫借六萬元支應	1962 年第二期計畫獲得美援九千四美金購買攝影機；臺幣二十七萬購買發射機與天線材料
建教合作	經常費四十三萬餘元	向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申請教育電視研究計畫經費	新臺幣一百萬餘元	列入 1963 年度計畫與政治大學、成人補習班、幼稚園及中小學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教育部、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與國立政治大學檔案

第一次會議結論，確定 1962 年 2 月 14 日第四次教育會議開幕時作「正式播出」，而這一期的試播，電子所再次提升發射機功率為一百瓦。過程中靈活地取得電信總局、光啟社、中廣與美軍顧問團的協助，以及師範、臺灣大學與國立藝術專校的協處。而黃季陸在當天不但做了象徵性的試播，同時請蔣介石蒞臨現場指導，蔣蒞會前由蔣夢麟（留美哥倫比亞大學、農復會主委與前北大校長）按鈕，民間人士從政的王雲五代表行政院致詞，自由派人士胡適觀禮。現場既官式但實質由留美自由派的雍容出席，這個歷史時刻，區別於八個月後臺灣電視公司的按鈕現場，其所象徵的統治結構下之政商組合（如蔣宋美齡與林柏壽）。

遲至 3 月，國立教育資料館才由發函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申請補助，將籌建計畫書送出，連同節目工作人員服務公約、節目計畫草案、節目編排準則、建教節目推行計畫、委託製作建教合作節目合約書送出一併確認，行政院這邊則於 1962 年 10 月收到籌建計畫書核備在案。

教育電視政策的文獻逐漸在 1963 年才逐步出土（教育文摘，1963），首先是由專門委員兼教育電視廣播實驗臺臺長劉家駿為文，提出教育電視的任務：第一、作為視聽教學的工具，輔導教學、充實課本內容；第二、在教師缺乏恐慌下，以優良教師轉播教學來彌補這個缺點；第三、提升學生受到的量能、提供老師觀察效果與競爭教學的動力。社教司長劉先雲也在歇後，提出成立之展望為文，他強調就學與升學率急劇提升的 1960 年代，建立空中學制為彌補增班設校的不足。最後，教育部長黃季陸以動員計畫的高度，定位教育電視是合於戰時與平時的教育策畫，他認為「反攻大陸」的時機逐漸成熟，一旦開戰，為維繫現有二百五十萬青年學生的受教權，需要有因應工具在手；第二以人口增加趨勢分析，未來十年受教數極為可觀，而教育經費呈倍數增長，十年後中等與高等教育需求在義務教育以上，必須有空中教育制度給予支應，否則難以維繫供需。

以上可見，教育電視廣播電臺的發展，逐漸成為一種純「教學」或者提供「替代性受教機制」的媒體，這與當時發展出的商業電視，其實相競爭之處甚少，更少於原本沿襲自美國的教育電視體制，該一體制尚有部分訴諸社會大眾的品味與訴求之處（宋乃翰，1962，頁 399）。但是這種發展的變化，也非本質如此，而是在 1961 年之時，

發生在臺視與教育電視開播之爭上，逐漸地引導分流而出。

這個爭辯部分導源於原本「電視機是否足夠供給人民收視」、「政府是否有足夠經費支付節目製作」兩大政論軸線，但是真實問題則在於「電視機銷售利益的分配」。自從曾虛白的上書創辦電視一舉被擱置後，美國的勢力勸進開辦之風漸消，日本的誘因逐漸明確化。1949年1月，中日合作策進會在臺北舉行會議，透過後臺人士運作（中國廣播公司為主，翁炳榮，2014，頁92-97），由政治人物谷正綱與何應欽出面，促進各界關心人士組成「中日電視事業合作研究小組」，其中也有李熙謀與劉先雲與會。這就是開啟了省政府與商業銀行，與日本電器廠商共同興辦的先河，該一協定於1949年4月簽訂（吳道一，1968，頁436）。

正當教育部同時如火如荼籌備試播之際，臺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於1961年12月發函至行政院，正式質疑教育部的行動方案，總結下列數點：

- 一、教育部以陽明山第二次會談結論處理本府竊以為不當
- 二、以目前「臺灣電視事業籌備委員會」之投入經驗顯示，教育電視臺未來想維持每日兩小時播出的經費與人才需求，必然不足以維持
- 三、當前政府經費困難與人才有限之際，教育電視臺不應強行推出
- 四、建請委託臺視製播教育節目為經濟有效之作法
- 五、送至民間收視機漸形普遍時，再視情況籌辦教育電視為宜

此為罕見之地方政府反對中央政府既定政策的正式來函臺灣省政府呈50(12)(16)府新秘字第88188號，顯見背後遊說壓力與可能高層的力挺介入。如果從1958年陳誠接任副總統兼閣揆的時代來看，一些矛盾顯然凸現出來：一來就是蔣介石必須分享權力，讓陳誠做主於政策及人事安排；二來就是不服此者，將聚攏於總統府的勢力範圍，伺機而動（林博文，2009，頁53-54）。臺視的籌辦決定臺灣方由周天翔負責，很多文獻都將其列入總統官邸勢力之代表人物（何貽謀，2002，頁21-22；翁炳榮，2014，頁78-80）。

然這只是一個開始，接續1962年1月20日，總統府國策顧問陶希聖來函，表達原委（以下所有函件往來，行政院，1962）。函件中陶希聖自述就是中日合辦電視廣播事業之發起人，而且表明前來溝通，實為周天翔所託，並轉述對於教育電視廣播電臺開播的疑慮如

下：

- 一、臺灣電視與教育電視之分野與關係無法釐清
- 二、以此，日方會以為藉口，拒簽投資合同
- 三、教育電視開播會否造成他人藉口申設電視臺登記
- 四、教育電視臺發射是否遵守國際規定
- 五、教育電視能否遵守節目以文化教育科學為限，不至影響臺灣電視事業與日方的約定
- 六、教育電視是否絕不涉及收視機及廣告的經營

通篇看來，周天翔與省府之顧慮，應該在於第六項，如果在日方以外，還有他者作收視機與廣告之經營，這項中日合作可能告吹。其實，同一時間社教司長劉先雲口述這個史實時，表達當場拒絕了周天翔的來訪，認其不安好意，僅就他的原議呈送黃季陸批示（遲景德、陳進金，1995）。接續1月24日，正式回函陶希聖，轉達部長言明的政策：

- 一、依照交通部所頒定規章，作試播計畫
- 二、發射頻率遵照交通部核發頻道辦理
- 三、節目完全以教學及教育性者為限，對象以學校為主，但也實施社會教育
- 四、不經營收視機買賣與廣告業務

然後，周天翔於1月26日來函，以強硬姿態，作禮貌性表達。首先對於黃季陸「堅決」辦理教育電視臺，深為「欽佩其精神」，這一點開場，顯見周天翔頗為自恃甚高，迥異於當時現行官場禮儀，明確表達諷刺敵意。同時對部長允認四點原則，要求當向各界說明，最後文末並未言明兩方爭議到此為止。

2月2日陶希聖又去函周天翔，轉達與黃季陸、劉先雲商議後的重點回覆，除了與上相四點相關外，點出更爭議一處，就是教育電視臺此舉會造成臺灣當時的商家以申請電視機進口為由。此事，可為臺視與日方最為關切之事。然陶希聖以交通部與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應作把關之據，來止息周天翔之慮。

顯然，這番解說無法了結省府方面的疑慮，2月10日，省府臺灣電視事業籌備委員會以（51）臺視秘字第10號發函給交通部，再次言明反對教育電視臺試播一事。文中直指教育部實驗臺是否有一千瓦功率發射之能力、每日二小時播出之規劃？是否違反「電視廣播電臺

設置暫行規則」？及電視設備與技術是否符合原定技術標準等疑義需釐清。總結，更提出與日本四家公司簽訂協議書中有規定「由於政府之決定或司法機關之裁決，致使公司正常業務停止或作實質之變更時」，日方得終止本協議。顯見，省府這邊把問題上綱國家層級，同時壓迫交通部要面對取消試播的必要。

如此排山倒海式的反對，於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函覆陶希聖文中（2月12日）可見一番。陳雪屏直說，省府新聞處長吳紹璉（前2月10日函文主文者）仍持反對立場，認為試播一例，必會造成民營電臺據此申請輸入電視機，如此影響中日合作契約之簽訂，最嚴重是無法完成「總裁」（蔣介石）之指示。但是陳雪屏文末卻說，教育部試播一事將無法改變，為產生問題之可見，請陶希聖在中央黨部成立審查小組來因應檢討，「以厲正辦」。

就此，果於2月13日之開播前夕，由中央黨部第四組召開「為協商教育電視廣播電臺設置問題座談會」，主席為該組負責人，也是國民黨中新聞事務決策的關鍵人士謝然之。該一協商最後達成七點結論如下：

- (1)、試驗執照並非正式開播
- (2)、不直接進口電視機，各級學校團體需求應由臺視代辦
- (3)、不得讓社會各界援例申請架設試驗電視臺
- (4)、不經營廣告與銷售電視機
- (5)、教育電視與臺視充分合作，在政府統籌下發展
- (6)、教育與交通兩部可透過中央社澄清此為試播
- (7)、雙邊發展應提報中常會，第四組也得隨時召集協商
- (8)、這份決議，中央第四組將函請行政院分轉主管同志查照實施

顯然，此一決議為了撫平省府方的否決力量，同時也讓教育部必須束手束腳來作電視業務之試播，可謂訂下相當不平等條款。但是，在這個爭議高峰點上，教育電視廣播電臺試播一事，始終受到技術審驗中立的「交通部」支持。如前述，2月7日該部以交郵（五一）第00757號呈文表示，依據陽明山文教措施研討會紀錄辦理，茲准教育部申設電視電臺，發給架設許可證。同時試播六個月後，准予改為一千瓦特規定，此之前暫作試播，並發給臨時證照。此一說明，捍衛了教育部立場，回絕了涵蓋省府、官邸派、周天翔與日方四公司的聯合遊說與攻擊。

此一支持力量，仍須納入 1958 年政府改組後結構的考察，更為易解。副總統陳誠奉命組閣，將長期由軍人主掌交通部的沿續中止，為新人新政，他聘請了長年（1948-1960）在外聯合國遠東防洪局（Bureau of Flood Control, ECAFE）任職局長的沈怡接任，並有蔣介石多次召見，表達兩人合意的任命，給予文人治理的正當性。沈怡上任，強調交通專業管理，任命政務次長費驊（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協助教育電視申請美援一事），並將電信總局局長錢其琛留任技監，綜以強化制度健全之行政（沈怡，1985，頁 264-270）。

這樣的背景之結構與新政，可謂立下一個專業監理與特許行政的基礎，咸讓電機交通專業的「教育電視廣播電臺」之試播本意，得以發揚，又能維持技術標準的促進，給予特許發展之核定，不畏政治特權勢力的圍困而就範。由此可見，教育電視廣播電臺此務，在這個 1950 年代末期，承繼了當時一絲自由主義與專業規範之遺緒，幸運地留下歷史性的成就紀錄，僅此雖未能開創大業，但是抗守住原本世界民主潮流中的稀有資源公共利益使用之標竿。

肆、教育電視臺開播歷史點之政治意涵

1962 年的臺灣，雖然由陳誠主政，暫時在蔣經國之外，有了不一樣的選擇。但是自 1958 年出版法修正案以來，言論自由的緊縮令人不寒而慄。蔣介石不願妥協，而且對於陳誠缺乏作為表達不滿，於是直接介入整肅計畫（薛化元，2020）。1960 年 9 月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在當年底發布自行停刊。胡適於當年 10 月返回臺灣，發表諸多不同意見，但是無法改變蔣介石辦人停刊的決定，而胡適本人於 1962 年 2 月 24 日因心臟病併發而過世，只晚於教育廣播電視臺試播十天而已。1961 年 10 月，蔣介石將葉公超召回臺灣軟禁，此後清華大學留美系統之政務人員，幾乎都不在美國與蔣介石的合議當中持續掌握要權（Tucker, 1994／新新聞編譯小組譯，1995）。

在這樣的政治嚴峻氣候之中，若檢視當朝政務人員，是否能表達議論與看法，實為所難。凡是能持守理想又需政策工具影響時局者，實難投入缺乏美國有效支持的民主的革新運動。這是本文檢視教育部當局的領導人物，須理解的背景。當然，更無可能期待試播的教育電視臺，會把這些政治上的事件列入內容，進行電視論政的功能，來象

徵民主革新。

但是如果從世界民主趨勢的發展來看，教育電視象徵一種電機科技的進步與社會公益的促進，臺灣在此的確與這一潮流有若干互動。就國際制度比較部分，如以教育電視為綱領，擴張視野到同一期發展中國家，收斂到同類型組合好作比較。細說這個標準，就是有受美國影響的區域、接受美援方案、電視的後進者國家者，得知南美國家是一個好的比較方案，如智利與古巴。

智利與古巴都是以教育電視為先進入者導入國家，與臺灣幾乎在同一年間，前者為 1958 年，後者為 1959 年 (Davies, 1999; Fuenzalida, 1988; Werthein, 1977)。智利雖然戰後深受美國政治經濟影響，但是在文化事務的菁英層次，卻對歐陸模式發展比較有信任。1958 年 Jorge Alessandri 總統當選，雖為美國看中的右派政權，但是總統本人否定消費財的經濟價值，希望社會節約，同時避免物價上漲，所以他反而支持大學對於教育電視臺的實驗方案，連續核發執照給 Catholic University 位於 Valparaíso 與 Santiago 校區，分別為 UC 與 UCV 兩臺；之後又核發給國立智利大學第九頻道執照。

這三臺就是 1970 年以前，智利相當重要的電視先鋒，就背後政治氣候來看也有原因，因為 Alessandri 總統政府，為一右派工商業階級政黨控制機構，但是也容納了中間政黨 Radical，所以未必完全買帳於美國與跨國資本，同時他獨排眾議，對古巴展現道義，不考量與其斷交，也不支持將古巴驅逐出 OAS 憲章方案。1964 年雖然繼任總統 Frei，更為美國人支持的右派政府，但是學院發生了質變。上揭大學，因著從美國導入較實用的社會學研究訓練，逐漸將國家發展的現代化學說視為時代正統，遠勝於行為主義學派強調的兩級傳播效果模式論，對於媒體與國家發展的需求結合，更加支持。

隨著天主教會，與學生團體對於改革的需求熾熱支持，Catholic University Santiago 校區導入兩個研究中心，包含 CEREN（國家現實問題研究中心）、EAC（傳播藝術學院）；Valparaíso 校區則導入傳播與意識形態研究中心。這個關鍵時刻，也讓法語區學者 Armand Mattelart & Michele Mattelart 加入天主教大學的傳播研究領域，產生了進步的力量，讓原本的教育電視續行擴大服務領域。

同一時期的古巴，在於革命發生後，更將之前美國三大電視網與時代雜誌公司的電視投資，轉變方向，支持建構國有化、非營利方

向，美國勢力於是退出。1959年，教育部轄下成立廣播電視委員會，將教育電視（ETV）理念付諸實現，最早實現 Teleclasses 小學電視教育方案，搭配教材一併執行。採行週間播放半小時（6:00-6:30 PM），每天一個主題單元進行。之後，將 6:30-7:00 時段開辦給國中階段的教學需求。

1961年開始，使用下午 02:00-04:00 時段，播出識字率教育，同時還加入現場報導勞工階級與學生學習效果的新聞，增進擴大施教的目的。從 1962年至 1964年間，再徵用 05:30-06:00 時段，播出成人與勞工的專屬教學。1966年國家電視系統重組成立節目部門，製作「流行技術學院」節目，提供農業生產提升教育。另外也有「走入鄉村的學校」節目，在省份中開辦，並藉此訓練國中的學生、老師一同參與教學製作，活動總時數為 45 天。

1969年以後，教育部成立古巴廣電學院（Cuban Broadcasting Institute），開始於大學教育結合，提供製作腳本與設備協助，以及聘請廣電專業人士來協助製片技術的傳授。總之，在革命政權的古巴，一體控制下，能讓教育電視循序往目標前進，獨樹一格。

這個同時期發展，當然迥異於臺灣的政治經濟氣候，為一個強烈的對比，可對照出臺灣教育電視的早期走向上的侷限，與後來萎縮的具體劣勢，但是，卻可以給予本國特色與全球位置之間清晰定位。依據宋乃翰（1962，頁 46）早期論著，由電機工程系主持教育廣播電視，是美國模式的特色，而且是發展先鋒之一。這樣來說，美國的民主傳播建構，多少最後由這批臺灣特殊的志士給予實踐，但是政治控制隨影而來的六零年代，必定沒有讓教育電視成為另外一種選擇，反而遭致吞噬（最後併入中華電視臺）。

而臺灣教育電視創臺之背後，這些 1949年在留美旅程中形成的視野與人格，在意外的教育部長人選布局後，找到位置，進入了一個超越文人革新的侷限。那回應「對民主不忠誠」的區域發展之脈絡而言，本研究案例具體呈現了如何現實，以下作一番小結。

無可否認地，五零年代之臺灣，是在美援資助下，必須接受美國民主價值的套裝，稍微讓蔣政權容忍一些從來在中國不具備的言論自由與多元的趨勢，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的成效與冷戰對峙的需要，蔣介石開始以自利作規劃，收緊原來放任出來的自由景況，在這個時代末尾，顯示出如下反動：

- 一、先進傳播科技的導入，被去除政治多元的馴化威權作用，改換至政治忠誠與經濟交易極大化的整合。
- 二、拆解留美政治與治理培訓的專業人才力量，孤立分化使其不能在政治結構中成為一種潮流，將多元消滅，將多族群聲音禁聲。
- 三、然而在這種鋪天蓋地來的背離民主的政治意圖，1958 年得到一個意外的發展，突然美國認同的一種差別化的政治結構出現，將原本國民黨黨部勢力要掌握的教育電視，改採一種全球模式異軍突起，超前商業電視的啟動而得到一個里程碑。但僅是一個里程碑。
- 四、接續，威權政權完全背離民主價值，以不合憲政與法治作法進行政治清算，禁聲反對意見，扶植侍從政治中的客戶，經營媒體來服務政權。

最後，以兩個核心的人物在六零年代的抉擇，來回應以上的歷史觀察發現。第一是政務次長浦薛鳳，連續是教育廣播電臺主責與教育電視籌備（部長住院期間）的部務負責人，也是 1961 年 2 月與聯合國 ITU 共同簽訂訓練中心方案的臺灣代表人。他於 3 月部長移交典禮後，5 月即接受美援教育委員會之推薦，計畫赴美講學一年，此後在美延聘多年後就不再回臺。浦薛鳳（1983）於回憶錄中，特別言及在臺灣 15 年當中，憶及清華好友出事者，就屬吳國楨與孫立人最為難言是非以定奪，對吳的離去尚有一些微詞，但對孫的遭遇則頗為不平之鳴，甚至提及王雲五也在當時頗有同感，此一言論也應可代表梅貽琦的心聲。最後，離臺之前甚至發言認為雷震的下獄為「求仁得仁」，實屬戰爭期的特殊遭遇。他的說法，很足夠做為清華留美派，能緣身 1950 年代臺灣的政界做決定影響，但又無能捍衛民主遭背叛的威權圖謀，此一趨勢下的無奈三聲。

浦薛鳳作為一名政治學者，不能逃避民主政治與新聞自由的關聯，他在一篇序文中（該著為《中國新聞法概論》），明確表達這兩者的正相關，同時也強調相對性的意義，將政治制度與應有的新聞自由結合起來，提倡相對原則無否認絕對真理之意（浦薛鳳，1981，頁 138）。對照吳國楨當年在美國（1954 年 2 月）接受美國 WGN 芝加哥電視臺之專訪，提出不同政治主張（殷惠敏，2016，頁 131），顯示這就是一個相對價值下，當地新聞自由可以接受的現象。據此，清華留美的學人都對此靜默，而不公開隨國民黨批判吳國楨，可謂最沉

默的支持吧。

而支持教育電視最力的部長黃季陸，的確在 1961 年上任後，實現了開播目標，同時也擬定了中長期發展計畫，甚至預算達八百萬之譜，造成政界的非議，認為他是「太空部長」，構築當時臺灣不需要的急切事務（李雲漢，1986；楊叔蓀，1986；劉世昌，1986）。然黃季陸於 1965 年被意外解職，轉任無政在身的國策顧問，從此投入歷史研究，為國家基礎作價，不再握有時潮的影響力至終。經多年後才由資深記者龔選舞（1993，頁 163）解謎，論到他的辭職，導因於當年在新任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啟航當下，以過去在同為政務官上意見不一，對於教文與財政需求之間的爭競不停，於是被內部舉報有報帳問題而受逼迫下臺。這也看到，教育電視最後的進步領導力量，終止於六零年代的保守勢力，成為時代意義的最終註腳。

伍、結論

本研究的動機，在於重新檢視臺灣電視史的既成說法。電視史論從教育電視開播早於臺灣電視公司的起點記載後，就停頓不論，以財力與技術不足，無能對比商業電視的臺視，而沉寂下來。此一說，將臺灣電視制度濫觴等同美國的商業價值觀，本文反思此一說法。

本文研訂，首先作教育電視政策失去記載的六年之回溯。這六年，從蔣介石親信張其昀擔任部長開始起算，1956 年創設了南海學園，順道提出教育電視成立的宏圖；接續現有記載跳至 1962 年的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作正式開播的宣告，而蔣介石也親臨會場視察。兩端的期中，沒有明確記錄，這就是本文要復原的六年。

本文發現，就部長張其昀的主張到黃季陸的實現之間，明確中介了一位不同出身的國府時期學術行政長才，被意外任命為教育部長，此人就是梅貽琦。梅貽琦在近代學術史上是不可忽視的人物，但是在電視史上完全無名。他本無初心要貢獻此一傳播事業的開創，但卻意外成就教育電視的建臺基礎。

本文透過史料分析，與傳播網絡關係交叉檢證，發現在一環節上他居於樞紐位置，可證他落實教育電視之理想。一方面來自梅貽琦早受到黃季陸影響，在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期間，共同見證電視文明的意義，這與曾虛白受美國國務院邀請的業務性考察，有全然不

同之視野；另一方面，梅貽琦其實是當時這個政務官圈中，唯一有長期在海外作「電視觀眾」的經驗，而且留下收視日誌。

梅貽琦任教育部長期間，繁忙於原子科學研究所的成立，實無可能再去籌謀電視的開辦，但是他的政務團隊依序讓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實現成為基礎。同時殊途同歸地，因為本身的電機學問與掌握清華基金的優勢，大力地協助交通大學復校並建立電子研究所，團結了當年國民政府所培訓出來的電子科學家，同一批人也熟嫻電視廣播科技知識。他默然的布局，反而讓電機工程研發與教育電視創辦的國際取向，落實成交通大學電子應用發展領域的選項之一。如此，成功避開了傳統爭辯電視消費與國家財政艱困的死纏局面，得到發展可能。

此一基礎，成為點子活躍與行動有力的部長黃季陸，善加使用，成就了後來超前的試播里程。至此，從政治發展而言，可見清華留美的自由派勢力，集結在此議題上，掌握了教育電視的發聲機會。1960年代初期開花的教育電視廣播電臺，對比《自由中國》的停刊，雷震與胡適淡出歷史的位置，這是自由幻滅之前意外綻放，見證了時代交錯的意義。所以，教育電視臺的開播點，其實反證了這是蔣介石政府，背棄原本美國價值所佈建的民主時刻表。如讓自由派的接班，教育電視臺超前商業電視發展，當屬合理，但是因國民黨的形式主義，以民主為工具性價值，來交換美援，一旦政權安定產生，就施展侍從主義政治，鞏固自我謀利政權，棄民主多元與公共利益於不顧，如此教育電視臺開播後，又沒落成殘補角色，也是預料之中。

總之，教育電視臺之超前成功，與一夕之間又沒落無聞，剛好見證了臺灣五零年代政治開放之曇花一現，與後來背棄民主逕行威權統治的事實。媒體科技導入與資源制度的配置，剛好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證偽命題，如果沒有民主文化的開拓，缺乏這個基礎的經濟與技術成長，難以導出現代化的公共電子傳媒之發展。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1986）。《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國史館。
- 王小涵編（1969）。《電視藝術》。臺北：廣播與電視季刊社。
- 田弘茂、朱雲漢、Diamond, L.、Plattner, M. 編（1997）。《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
- 江才健（1989年7月11日）。〈感時憂國的物理學家 訪問吳健雄博士〉，《中國時報》，27版人間副刊。
- 行政院（1962）。《教育電視電臺設置案》（檔號：0050/9-3-6-12/1）。臺北市：行政院。
- 宋乃翰編（1962）。《廣播與電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李熙謀（1967）。《交大電子研究所八年》。新竹：交大同學會友聲月刊社。
- 吳道一（1968）。《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
- 沈怡（1985）。《沈怡自述》。臺北：傳記文學。
- 李雲漢（1986）。〈哀悼黃季陸先生〉，黃乃興編《黃季陸先生紀念文集》，頁233-242。桃園：黃乃興自印。
- 何貽謀（2002）。《臺灣電視風雲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周培敬（1991）。《中央社的故事（下）》。臺北：三民書局。
- 林博文（2009）。《1949 浪淘盡英雄人物》。臺北：時報文化。
- 岳南（2019）。《大學與大師：一九三〇至一九六〇，烽火中的大學如何奠基百年教育》。臺北：時報文化。
- 浦薛鳳（1981）。《政治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浦薛鳳（1983）。《相見時難別亦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胡光熙（1981）。《中國現代化的歷程》。臺北：傳記文學。
- 陳國祥（1979）。《青年呼聲》。臺北：四季。
- 陳力俊（2020）。《水清木華：清華的故事》。臺北：致出版。
- 徐鉅昌（1986）。《電視傳播》。臺北：華視。
- 翁炳榮（2014）。《我與廣播電視：兩岸三地廣電推手翁炳榮回憶錄》。臺北：就業情報資訊。
- 殷惠敏（2016）。《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臺緣起緣滅》。臺北：允晨文化。

- 張其昀（1953）。《黨務概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張其昀（1955）。《新教育論集（第二冊）》。臺北：中國新聞。
- 張其昀（1957a）。《新教育論集（第五冊）》。臺北：中國新聞。
- 張其昀（1957b）。《新教育論集（第四冊）》。臺北：中國新聞。
- 張其昀（1958）。《新教育論集（第六冊）》。臺北：中國新聞。
- 張俊彥（1964）。《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研製電視發射機總報告》（檔號：304-0101-0008）。新竹市：交通大學。
- 賴淑卿編（1986a）。《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第一冊》。臺北：國史館。
- 賴淑卿編（1986b）。《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第二冊》。臺北：國史館。
- 賴淑卿編（1986c）。《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第三冊》。臺北：國史館。
- 教育部（1962）。《為本部籌建教育電視所需器材費用函請轉洽列入美援由》（檔號：0052-C801-01-02）。新北市：國立教育研究院。
- 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1962a）。《教育電視實驗電臺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檔號：0052-C801-01-20）。新北市：國立教育研究院。
- 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1962b）。《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來文請墊付新臺幣三萬元裝置電視備份機器》（檔號：0052-C801-01-20）。新北市：國立教育研究院。
- 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1962c）。《呈為教育電視實驗電臺經費為著請准援款補助以維業務由》（檔號：0052-C801-01-20）。新北市：國立教育研究院。
- 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1962d）。《為函送教育電視研究計畫等請查照惠予撥款由》（檔號：0052-C801-01-28）。新北市：國立教育研究院。
- 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與國立政治大學（1962）。《為遵令訂定研究教育電視合作計畫報請核備由》（檔號：0052-C801-01-25）。新北市：國立教育研究院。
- 教育文摘（1961年）。〈陽明山第二次會談結論〉，《教育文摘》，6(9)：30-34。

- 教育文摘（1963年）。《教育電視廣播電臺成立紀念特刊》。
-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
- 盛慶球（1975）。〈李熙謀先生與交通大學〉，李故代表熙謀治喪委員會編《李熙謀先生哀思錄》，頁36-40。
- 梅長齡編（1984）。《電視的原理與製作》。臺北：黎明。
- 曾虛白（1955a）。〈迎頭創建電視事業的重要〉，董顯光等著《新聞學論集》，頁156-165。臺北：中華文化。
- 曾虛白（1955b）。《東遊散記（旅美見聞錄）》。香港：亞洲出版社。
- 馮志翔（1974）。《蕭同茲傳》。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彭懷恩（1990）。《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風雲論壇。
- 黃乃興編（1986）。《黃季陸先生紀念文集》。桃園：黃乃興自印。
- 黃季陸（1986）。《黃季陸先生懷往文集》。臺北：傳記文學。
- 黃富三（2010）。《電信巨擘：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編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印記六》。臺北：行政院檔案管理局。
- 新新聞編譯小組譯（1995）。《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臺北：新新聞文化。（原書Tucker, N. B. [1994].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New York, NY: Twayne Publishers.）
- 趙友培（1975）。《文壇先進張道藩》。臺北：重光文藝。
- 劉世昌（1986）。〈永遠活在我的心中—追憶我最崇拜亦最親近的季陸先生〉，黃乃興編《黃季陸先生紀念文集》，頁201-219。桃園：黃乃興自印。
- 楊叔蓀（1986）。〈追思—悼念盡瘁黨國的一代賢哲黃季陸先生〉，黃乃興編《黃季陸先生紀念文集》，頁133-137。桃園：黃乃興自印。
- 楊儒賓、陳華（2006）。《梅貽琦文集【日記】1：一九五六～一九五七》。新竹：清華大學。
- 楊儒賓、陳華（2007）。《梅貽琦文集【日記】2：一九五八～一九六〇》。新竹：清華大學。
- 遲景德、陳進金編（1995）。《劉先雲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

館。

- 謝國興編（2015）。《浦薛鳳子女海外書簡》。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薛化元（2020）。《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臺北：遠流。
- 龔選舞（1993）。《龔選舞回憶》。臺北：時報文化。
- Linz, J., & Stepan, A. (1997)。〈邁向鞏固的民主體制〉，田弘茂、朱雲漢、Diamond, L.、Plattner, M. 編《鞏固第三波民主》，頁 65-96。臺北：業強。
- O'Donnell, G. (1997)。〈關於民主鞏固的迷思〉，田弘茂、朱雲漢、Diamond, L.、Plattner, M. 編《鞏固第三波民主》，頁 105-129。臺北：業強。
- 有馬哲夫（2013）。《こうしてテレビは始まった：占領・冷戦・再軍備のはざままで》。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 Balas, G. R. (2003). *Recovering a public vision for public televis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Davies, M. (1999).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le: Na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transnational hegemony*.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Fuenzalida, V. (1988). Television in Chile: A history of experiment and re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8(2), 49-58.
- Luther, C. A., & Boyd, D. A. (1997). American occupation control over broadcasting in Japan, 1945-1952.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2), 39-59.
- Schwoch, J. (2009). *Global TV: New media and the Cold War, 1946-69*.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treeter, T. (1996). *Selling the air: A critique of the policy of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rtheim, J. (1977). Educational television in Cuba. In G. Gerbner (Ed.), *Mass media policies in changing cultures* (pp. 131-133).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Revisit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Regarding Television Development and Its Origin in Taiwan: Questioning the State toward the Illiberal Democracy by Policing Educational TV

Hamilton Chung-ming Cheng*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television is documenting firmly upon the great influence of American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on its postwar nation-building. This research is questioning the above saying by one rediscovered upon the debate for educational TV (ETV) from 1956 to 1962.

Based on the recent unearthed documents, one revisited this topic is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ical study on certain figures l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ETV and its policy is gone through a contradictory process between U.S. democracy introduction and its backlash from taking back control by authoritarian state. The short success of educational TV service in 1962 is overshadowed immediately by Chiang Kai-shek's will to overthrow the liberal democracy channeled by U.S. aid. However, the transition to monopoly media and state in sixties documented by this criticism is shed the light on the study of emergent TV in Taiwan.

Keywords: U.S. aid., China Institute, Educational TV, Communication Policy,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aiwan

* Hamilton Chung-ming Cheng is 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t the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Taiwan.